



人文主义的视界

RENWENZHUYI DE SHIJI

跨世纪学者丛书

KUASHIJI XUEZHE CONGSHU

汝 信 主 编

陈 来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跨世纪学者丛书

人文主义的视界

陈 来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跨世纪学者丛书

人文主义的视界

陈 来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1 印张 插页 2 237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精)

ISBN 7-5435-2608-5/G·1995 定价:22.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陈来, 1952 年生于北京, 籍贯浙江温州。1976 年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毕业。1981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 获哲学硕士学位。1985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 获哲学博士学位。1981 年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6 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1990 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86 年至 1988 年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 年至 1996 年任东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主要著作有《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宋明理学》、《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古代宗教与伦理——儒

内 容 提 要

“五四”以来，文化激进主义的盛行，使中国思想传统经历了巨大的冲击，中国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毋庸置疑，“五四”以来的文化批判运动，在促进 20 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工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主导 20 世纪中国思想运动的文化激进主义，在推进了革命、变革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制造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困境，从而使得对这一思潮的反省，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经济腾飞和文化复兴的重大课题，成为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

本书不仅在宏观上对中国近代思想作了回顾与前瞻，并对“五四时代”和“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特别着重于在文化观上深入检讨文化激进主义的遗产，力图在学理的层面揭示文化激进主义的偏失。另一方面，以传统与现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联结为核心，致力于回应韦伯理论，阐述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社会和现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作用、定位及儒家思想在东亚地区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意义和可能的贡献。

主编 汝 信

编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方克立 王俊义 厉以宁

叶秀山 汝 信 刘国光

严家炎 张 炯 吴元迈

郑 敏 林甘泉 罗国杰

金克木 谢 冕

编委签名

罗国杰 卢俊 厉宁 方克立
林东 刘国光 谢子建
叶如 张炯 吴元迪 王德文
郑敏 严家炎 金林

总 序

| 女 侯

时代在前进，世界正阔步迈向一个新的世纪。将要告别的20世纪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即将来临的21世纪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中国在本世纪的荆棘载途、崎岖曲折的道路上是怎样走过来的？中国在下一个世纪又将以怎样的面貌出现于世界？处于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跨世纪学者丛书”的出版就是试图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见解。继往开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是学者应该肩负的使命。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近年来活跃于我国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思想敏锐，视野开阔，是所谓“跨世纪”人才，下一个世纪我国学术研究的重任将主要由他们来承担。所以，由他们来探讨“跨世纪”的问题，我以为是很合适的。

丛书所探讨的中心议题是文化问题。近一个时期以来，文化建设作为精神文明的核心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终于认识到，一个民族要振兴，一个国家要强盛，除了首先要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外，还必须创造高度的现代文化。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文化建设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搞好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一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在这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悠久文化传统,深入地研究、继承和发扬祖先们留下的这份巨大精神财富,无疑是文化建设的任务之一。但是,世界和中国都已经和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中华民族要能跟上世界潮流,完成现代化事业,在文化建设方面也不能抱残守缺,墨守成规,而需要不断革新,创造新文化。不过新文化的创造决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基础,如果割断历史,离开几千年民族传统的土壤去建设新文化,那它就像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一样不可能持久,也不会有生命力。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决不是意味着传统的断裂,而是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使中华传统文化能适应世界潮流和现代社会的要求而变革更新,得到新的发展,使传统和现代化达到辩证的统一。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不管它曾经多么辉煌,一旦它不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而停止创新,那么它就将因创造力的枯竭而逐渐消亡。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至于应该怎样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那末历史也已充分证明,一个国家闭关自守,把自己同世界隔离起来,拒斥外国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只能导致停滞落后,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尤其是在当代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国际交往日益密切、信息交流十分便捷的情况下,要想把一切外来文化都拒之于国门之外,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今天要想建设高度的现代

新文化,惟有实行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积极引进和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当然,这不是盲目地照抄照搬,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需要,有分析、有选择地吸取和消化外来文化中有益的养料,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融会创新,来发展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该丛书的作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和探讨“跨世纪”的文化问题,阐明了各自的观点,发人深思,我相信会对广大读者有所裨益。

1996年8月

前 言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对近代以来有关的文化讨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作的一种反思。由于作者的文化立场是在“批判的继承”的原则下，肯定儒学价值传统与世界其他大的宗教传统一样，在现代社会仍有其意义，而对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化观持批判态度，因此我有时会被问到对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看法。借此机会，我想就人文学科研究中的“文化的保守主义”概念及相关的问题略作讨论如下。

晚近学术界或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主要思想派别，或以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主要派别，但多共认各派之间虽然有分歧、对立，“他们所思考和企图解决的大体上都是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进西方，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等问题；他们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共同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主题；他们都向西方寻求真理，但都

想避免西方文明发展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严重缺点；他们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在思想上都具有文化启蒙的性质和特点”^①。严格地说，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是西方学术用以处理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范畴，事实上并不能够把这三个范畴简单地在前面加上“文化”来变成文化观的范畴。比如，虽然可以在定义的前提下建立“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的概念，但“文化自由主义”的说法就很难成立，而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却可能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者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尽管如此，一般都承认，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得比较充分，而对文化保守主义派别的文化观点、研究成果和理论贡献重视不够。

那么，应用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本杰明·史华慈(B. Schwartz)早就指出：“五四时代出现的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发明一个新的词汇去指称他们，并把他们和什么‘守旧派’区别开来，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他指出，20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柏克式的保守主义，“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许多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多半很清楚哪些是该保留下来的文化要素”^②。然而，由于中文语境中“保守”已经被赋予了浓重的贬意，以至于

① 参看方立立的《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3期。另参看汤一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摘要丛书·总序》，其中提出文化转型时期所形成的这三派显示出不同的反应和不同的思考层面，三种不同趋向的文化合力推动着文化的发展。

② 本杰明·史华慈：《论保守主义》，载傅乐诗(C. Furth)编的《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3页。

连西方的中国研究专家都不赞成把西文中的 cultural conservative 译为中文的“保守”，而希望用“守成”，即“文化守成主义”来表达西文对应词的意义。本来，保守、反现代化，在西方学术的语境中不仅没有贬意，而且还有一种比较深刻的含义。而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在西文中，前缀词“文化的”的限定，使 cultural conservative 并不排斥对社会的改革意识与对传统的批判一面，这在中文中却常常被忽略。艾恺(Guy S. Alitto)说明：“民初时代思想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全盘批评和攻击，同时提倡更深更广地引进西方文化。在差不多同时期，和反传统主义相反对的思潮也出现了，即面对日益增强的西化所产生的文化守成反应，他们提倡融合中西文化，提出未来的世界文化会是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体，我把这种主张称做文化守成主义论。”^①

中国学者一般也接受这种用法：“他们(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概念，以区别于极力维护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指那种立足于传统文化，力图融会古今，也有选择地吸纳外来文化，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倾向或思想派别。他们在政治上可以很进步、很革命，甚至十分激进，但是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却很谨慎、很保守，温情脉脉，谨守先业，惟恐弃我故常。有这种心态的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可谓屡见不鲜，章太炎是一个例子，曾经参加辛亥革命的现代新儒家学派的精神领袖熊十力

^①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① 不仅研究“五四”以来思想分合变动的历程应用了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在对“五四”以前思想人物的研究中也同样如此。研究张之洞的学者认为:“‘文化保守主义’是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时候,伴随着激进主义应运而生的一种重要流派。这里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并非指那种抗拒社会进步和文化变革的顽固派所持的抱残守缺主义,这样的货色早已被历史抛弃。张之洞所阐扬的文化保守主义则富于开明性格,他并不一般地排拒进步和变革,而且还曾经有力地推动过某些社会进步和文化变革。不过,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明显差异在于,第一,文化保守主义反对激变,主张渐变、缓进;第二,文化保守主义反对全变,坚持《易传》的变易与不易的统一,认定文化的某些层面如器用及制度的某些外沿部分是可以变、必须变的,某些层面如伦常及制度层面的核心部分则不可以变、不应当变;第三,文化保守主义不一般地肯定文化的世界性、人类性,而认同文化的民族性、国度性。在中国近代及现代文化史上,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各有短长利弊,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们彼此论争,相互映照,共同构造出相反而又相成的文化纽结。”^② 其实,激变或渐变的问题还是属于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这并不是“文化的”保守主义的问题。在近代思想的发展中,文化保守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与反传统思想相反对的文化的主张。

所谓文化的保守主义不仅是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一种文化

①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载《南开学报》1989年第4期。

② 冯天瑜:《张之洞评传·篇首语》,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反应,也同样是面对现代工商社会病症的一种文化呼声。在这个方面众所周知的例子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以“精通马克思”著称的贝尔是美国60年代以来“从内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力量”的代表之一^①。贝尔追求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平等,同时具有对美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批判眼光。70年代以后,在学术理论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体系趋于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价值观念的广泛心理,一反60年代的过激倾向,要求恢复道德约束和文化秩序^②。贝尔的思想不仅代表了这样一种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出人的价值结构可以是多元的、复合的,他并不拒绝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相反,他认为自己既是社会主义,又是自由主义,也是保守主义。更准确地说,他认为自己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并且自信对他个人来说这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文化方面,贝尔的“深沉冷静的文化保守主义”站在思想精英和文化监护人的立场,对大众文化和平民运动采取严峻的审查态度,对自由主义哲学加以反思。他注重信仰和权威,维护文明的延续,“更多地传达出他对历史的参悟及一种已臻成熟睿智的思想境界”^③。他自己说,“我在文化领域中是保守主义者,因为我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绪言》,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页。

②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绪言》,第5页。

③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7页。

诉人们先人们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①。他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以此作为维护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示,还具有很深刻的宗教关怀的意义。他指出,在近代西方的历史发展中,“经济冲动”和“宗教冲动”构成了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而在当代的资本主义时代这两个基因的关系已严重失衡,只剩下经济冲动。对经济冲动有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的宗教冲动已奄奄一息,功利、消费、及时行乐、拜金主义无限扩张。经济冲动成为社会前进的惟一主宰后,世上的事物都被剥去了神圣的色彩,社会更加世俗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庸俗和平庸,终极意义的危机日益严重。他期望着人意识到人生的局限,重新回到对神圣意义的发掘上来^②。贝尔的例子说明,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在极端商业化的社会中守护文化与价值的积极力量,是对商业化本身和布尔乔亚功利文化的约束、平衡和批判的力量,其锋芒直指商业化带来的意义、价值的消蚀。对于一个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如何为现代化工程建立适当的人文环境,也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由此可见,由西方学术界开始使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概念,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指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反对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观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的、粗暴的破坏,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另一是指在社会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守护人文价值、审美品位、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年《再版前言》,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②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年《再版前言》,第40页。

文化意义及传统与权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种立场。正如我在多年前所指出的，这种文化意义上的“保守”并不是消极的，只是说，与完全集中于政治或经济的功效相比，他们更注重文化与价值；与要求决裂式的文化变革相比，他们更多地要求对传统的继承。如果更准确地说，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观点，就是“反反传统主义”和“反泛功利主义”的文化观点。

毫无疑问，我对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观有相当多的同情了解，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同意给自己贴上这么一个标签，事实上我对这个概念是有保留的，而我更不赞成那种以给别人贴标签为能事的做法。同样明显的是，经历了长时期的对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观的盲目批判与完全否定，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对现代化转型中的文化论争越来越以理性、冷静、辩证、分析的态度来加以研究，这不仅体现了历史研究的进步，更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对学术思考的促动。

很明显，不管我们是否赞同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文化保守主义只是一种文化观。也正惟如此，文化保守主义可以与不同的经济、政治观点结合，而成为一个人的价值结构，正像丹尼尔·贝尔一样。这种文化的多样组合在历史上司空见惯，如辩证法在哲学史上常常和各种哲学本体论结合，有和唯心主义结合，也有和唯物主义结合或其他主义结合一样。然而，自80年代以来，一种单一的、一元化的、泛政治思维定势常常困扰着学术界的开放性思考。80年代不少人把文化保守主义等同于反对革命的保守主义，90年代更有把文化保守主义等同于否定革命的保守主义，这些看法既不符合近代思想史的历史，也不符合当代社会的思想现实。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可能是主张激进的革命的，但不能因此便把文化保守主义归结为